张元济撰

校史随笔

蓬莱书

张树年 等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元济

撰

校史随笔

蓬莱阁丛书

张树年 等 导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书

FG73/24

上海古籍出版社

逢莱阁丛书

校史随笔

张元济　撰

张树年　张人凤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126,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5-2510-4

K·280　定价：9.60元

China

出 版 说 明

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有"汉家石渠阁，老氏蓬莱山"之称，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

China

《校史随笔》导读

张树年　张人凤

《校史随笔》是张元济先生的一部古籍校勘学专著。“史”者，即《二十四史》。这本书记录了他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主持校勘、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原书初版于 1938 年。

张元济先生，字筱斋，号菊生，1867 年 10 月 25 日生于广州。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他 18 岁中秀才，23 岁中举人。1892 年 26 岁中光绪壬辰科第 24 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散馆，分派至刑部，任贵州司主事。曾创办通艺学堂，并参与维新变法活动。戊戌政变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离京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 年，张元济应创办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出版物，不仅以其高质量著称，而且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始终服务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到30年代初期,商务无论规模还是出版物质量和印刷技术水平,都能与欧美同行媲美,亦即中国人以30年时间走完了欧美一、二百年走过的路程。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长达14年的艰难岁月中,张元济与李拔可、王云五等一批商务同仁一起,因时因地制宜,苦撑危局,坚持出版工作,不与日伪势力合作,不向日伪势力屈服。后来他又把饱受战祸和恶性通货膨胀之害的老企业坚持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元济先后担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祖国和平统一献计出力。在晚年病魔缠身之际,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古籍版本目录学著作《涵芬楼烬余书录》。他留下的著作还有《宝礼堂宋本书录》、《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丛书百部提要》以及后人为他整理的《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诗文》等。

张元济对古籍情有独钟,除了具有扎实的旧学功底,恐怕还与家庭文化背景有关。他14岁与父亲诀别,后来能回忆起父亲的教导之一,就是讲述海盐张氏涉园的藏书。张氏从明清以降,为官者很少,而大多以著述、刻书、藏书为业。祖居涉园成了文人雅士聚会之所。张元济九世祖张惟赤的《人告编》,六世祖张宗松刊《王荆文公诗笺注》及六世叔祖张宗柟辑《带经堂诗话》、张宗橚刊《词林纪事》等,均流传至今,为学人所重。张宗松的清绮斋藏书达1559部,不下万册,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后来家道中落,藏书散尽,书板毁于太平军战火。

然而,张元济真正接触到善本古籍,是在1902年之后。

China

当时商务印书馆成立了编译所，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必须购置大批参考书。1904 年张元济主持设立编译所图书室（后定名涵芬楼），经蔡元培介绍，首批购入的古籍是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的 50 余橱藏书。编译所的书生们得到读好书的机会，兴奋之余还建议登报征购。果然，太仓顾氏谦闻斋的后人前来求售。张元济与孙毓修同往观看，“稍稍翻阅，大都为黄荛圃、汪阆源两家之物。”（《涵芬楼烬余书录序》），此外还有张金吾所辑的《诒经堂续经解》，使购者满载而归。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浭阳端氏的宋刊《六臣注文选》、荆川田氏的宋黄善夫刊《史记》、宋绍兴刊《后汉书》等善本，在社会大变革、封建时代的藏书楼走向终点的时候，纷纷流入了涵芬楼的书架。由于张元济的努力和商务的经济实力，涵芬楼到 1932 年被日寇焚毁前，藏有古籍 3203 种，29713 册；购入扬州何氏藏书未及编目者约 4 万册；各地方志 2641 种，25682 册。这批古籍的焚毁，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大浩劫，张元济为之叹息、流泪。所幸张元济在战前为防止不测，将宋、元、明刊及钞校本、稿本 547 部 5 千余册储入租界内银行的保险库中，幸免于难。日寇占领上海时期，为了不使珍本落入侵略者魔爪，商务几位董事曾将一部分书籍秘密分散转藏各自家中——秘密到连家人都不知道，抗战胜利后才收回点清。解放后归入北京图书馆。

张元济之所以为涵芬楼大量购入古籍，除了用作编译参考资料和作为影印古籍的底本，以开辟商务古籍影印出版业务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感到国势衰弱、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同时，作为数千年中华文化的载体——古籍的命运岌岌可危。本世纪初，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归安陆氏皕宋楼悉数为日本人购去。事先，夏瑞芳闻讯，表示愿以

China

8万元收购。张元济两次求见，欲求一睹其收藏均遭拒绝。1906年张元济进京，求见荣庆相国，请求政府出资收购，为今后京师图书馆的基础。荣庆置之不理。后来张元济为此事“每一追思，为之心痛”。张元济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构想：以商务的经济实力，收购国内藏书楼散出的善本，以此作为一个从事文化出版事业的知识分子为国效力的途径。使他始料不及，也是更为痛心的是苦心经营20余年的涵芬楼成为侵略者的劫灰，古籍没有逃脱厄运。不过他没有灰心，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他与郑振铎等致电重庆当局，要求拨款收购江浙沪一带散人上海书市的珍本并为之出了不少力，又与叶景葵等一同创办合众图书馆，接纳藏书家的捐赠，并率先将自己多年收购到的海盐张氏先人著述及涉园收藏过的书籍一并捐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张元济在古籍收藏中蕴涵着他的一片爱国深情。

张元济在古籍研究方面，曾受到版本目录学大师缪荃孙的指点。缪荃孙字筱珊，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总纂，任多处书院主讲，创办江南图书馆，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其艺风堂藏书甚丰。可惜他们的交往由于留下资料极少，很难作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张元济入商务后，很快跻身于缪荃孙、徐积余、刘承幹等大藏书家行列，与他们切磋学问，互相观摩各自的收藏，无疑从中得到过不少帮助。在古籍研究和出版方面对张元济帮助最大的是傅增湘。傅字沅叔，号藏园，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任教育总长、大总统顾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毕生致力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校书16000余卷，撰有题跋500余篇，有《藏园群书题记》等多种著作。张、傅初识于

China

1911 年清政府学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以后数十年中，他们在京、沪两地书信不断，研究版本、商购古籍，探讨学术，至今存世的书信多达 30 万字。

商务印书馆采用照相石印影印古籍，始于辛亥前后，并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摸索。张元济在古籍出版方面的主要助手是孙毓修。孙字星如，江苏无锡人，清末秀才。他曾从缪荃孙学习版本目录学，自己又有藏书，在多年协助张元济工作之后，留下了《中国雕版源流考》等著作。1911 年，商务开始用照相影印宋本《韩昌黎集》。张正在北京，他在给孙毓修的几封信中，讨论印样质量，对所用油墨、中缝宽度、母本书内污点和历代藏书家红色印记的处理都指导得十分具体。信中再三强调决不可草率从事，必须做到宁缺毋滥，为日后商务版古籍开创出一个典范。

1916 年，涵芬楼的藏书已相当丰富，其中不乏人间稀见之本。为使这些珍本得以流传，不致因万一遇到灾变而失传，张元济设想仿照毛晋刻《津逮秘书》、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的方式，选印涵芬楼珍本，编为《涵芬楼秘笈》丛书出版。这部书大多采用原书、原稿影印，也有少部分用铅字排印。全书 10 集，共收书 51 种，1916 年至 1921 年出版。

《四部丛刊》是商务古籍出版的一项重大工程。在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张元济从 1915 年起开始构思、策划出版一套大型古籍丛书。他的目的有二：提高商务出版物层次，并获得经济效益；凭藉商务经济实力，在时代变革中，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他策划的一部大丛书应有几个特点：一是收集我国典籍中常用、实用的书籍，即所谓“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印行四部丛刊启》）。二是由于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籍流传中，刻板越多，错误越多，因此必须选择时间最早、面貌最真的版本作为母本；三是采用最新的印刷科学技术，不仅出书快，而且原书面貌丝毫不改。丛书的书目由孙毓修提出，张元济改定，还征求了傅增湘、刘承幹等人的意见。最困难的工作是母本的选定。其时涵芬楼藏本虽不少，但书囊无底、善本无穷，藏书家手中到底有哪些珍本，外人是很难一见的。即便知道了藏书的信息，要向他们借，借到工厂来摄影，更是难上加难。张元济凭藉他本人的声望、与藏书家的友谊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社会声誉，取得了不少藏书家的信任。他亲自登门拜访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派孙毓修赴南京江南图书馆借照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本。经过很大努力，收集到了大批上好的母本。《四部丛刊》从 1920 年 6 月起，分六批出版，到 1923 年 3 月出齐，全书共收入古籍 323 种，2100 册。1926 年至 1930 年初，重版一次，更换了 21 种书籍的底本——因为找到了时间更早、更完整的版本，另有 44 种增补了缺卷和缺页。1933 年，“一·二八”事变后商务的复兴稍见起色，张元济全力投入续编、三编出版。两编分别收书 81 种和 73 种，各 500 册。《四部丛刊》不仅收集到当时能见到的最佳版本，还有像《平斋文集》，将铁琴铜剑楼所藏半部影宋钞本与张元济在日本内阁文库见到的另外半部配成了一部完整的书籍影印出版；昆山图书馆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本、南浔刘氏嘉业堂藏查继佐《罪惟录》手稿，都是保藏了二、三百年，未经刊印的孤本，这次在《四部丛刊》中，化身千百，得到了长期流传的可能。张元济、孙毓修、姜殿扬、胡文楷等人，对每一部书都进行了校勘，采用多种版本进行对校。张元济亲自写了 42 篇校勘记，列出某字、某句在不同版本中

China

的不同情况，附于正文之后，使读者读了《四部丛刊》本，就相当于见到了几种版本，大大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张元济为《四部丛刊》各书写了 109 篇跋文，叙述这些书籍的成书经过、版本源流和不同版本的优劣比较。这批跋文成为他古籍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

《续古逸丛书》是张元济受清末黎庶昌辑印《古逸丛书》的启发而影印的另一部古籍丛书。黎在使日期间，将 26 部中国本土失传的古籍覆印成书。《续古逸丛书》的成功之处，在于采用最好的宋版为底本，影印本与原书同样尺寸，字大悦目；深蓝色书涵，黄褐色书面，古朴典雅，完全是艺术复制品。近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把原书开本缩小，印成精装本，虽署上“张元济主编”之名，却已失却了张元济的本意。这部丛书没有，也不必要有严密的出版计划。借到好的底本，出上几种；没有理想的版本，就搁上几年。印量也很少。1957 年商务为纪念 60 周年馆庆，出了第 47 种，即最末一种《宋本杜工部集》，使这部丛书成为商务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古籍丛书。

张元济为《丛书集成》的出版作过指导，为 100 种古籍丛书编写了简介《丛书百部提要》。为《四库全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未获成功，最后影印出版了《四库全书未刊珍本》。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在日本侵略军大兵压境的险恶环境中，与王季烈合作，校勘并出版了发现不久的《孤本元明杂剧》。张元济主持出版的商务版古籍，形成了民国时期我国古籍整理、校勘、出版史上的新高。为此，张元济以其古籍出版成果，经全国科学家层层推荐选拔，于 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院士，列名人文组中国文史学科。

China

我国历代都十分重视修史,历史学是我国发展最早的学科之一。数千年来,有着丰富的史料和史学著作积累。被历代政府认定的史籍称为"正史",共有 24 部。人们称之为《二十四史》,它们构成古代传统史籍中的主干史书体系。

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对正史的保存、流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大规模刻印经史,始兴于五代。宋太宗淳化年间,开始刻印三种正史:《史记》和前、后《汉书》。(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见《校史随笔·汉书·景祐本之由来》)到仁宗嘉祐之际,《十七史》都经刷印,为我国刊印正史谱写了新的完美的纪录。金兵南下,战乱中书板大多毁损。高宗南渡以后,社会稍见稳定,正史的刻印又蓬勃发展起来,刻书地点遍及州郡。但这些印刷,大多是另种单行。宋绍兴十四年(1144 年)四川漕井宪孟在眉山校刊《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是正史刊行史上第一种汇刻本,人称《眉山七史》,又称"蜀大字本"。(见《校史随笔·南齐书·眉山重刊本》)因版印模糊,被称为"九行邋遢本"。现存眉山原刊,仅《宋书》残册一种。尚有原刊加上元、明递修称"三朝本"者,有一定的版本价值。

第二种汇刻本是元大德本《十七史》,为建康道下属九路(路为元代隶属于省的第二等地方行政建制)分任刊刻。《校史随笔·隋书·元大德九路刊本》有较详细介绍。大德本校刊精勤,得学人好评。

第三种是明南、北监本。"南、北监"指明代设于南京、北京的国子监。明代重视史学,刻书亦最勤。南监本成书于嘉靖七至十一年(1528—1532 年);北监本成书于万历二十四至三十四年(1596—1606 年),系据南监本重刊。南、北监本存

在的问题颇多。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嫚笑”。张元济《校史随笔》也批评说:“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旧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从字顺。然以言行文则可,以言读书则不可。”(《校史随笔·北齐书·因刊误而愈误》)

第四种是汲古阁本《十七史》,系由明末藏书家毛晋延请名家校刊。书成于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因朝代更迭,中间有所损失而修补。毛氏所刻流传颇广,影响很大,但错误也不少,藏书家、校勘家对之毁誉参半。

以上几种汇刻本,因年代较早,流传至近代已经很少了。对近代影响最大的是“武英殿本”,是最早的《二十四史》,成书于清乾隆四至四十九年(1739—1784 年)。乾隆年为清代极盛时期。清廷召集一批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如齐召南、杭世骏等参与其事。除《明史》、《旧五代史》为初刻,两《汉》、《三国》、《晋书》、《隋书》依据宋元旧刻之外,大部份依据明南、北监本。由于所用底本较差,即便用宋、元旧刻者也未必是最佳之本,这样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尽管校勘诸臣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所得出的本子却并不理想。当时以皇家的力量,搜寻存世的古本作为蓝本,应该是可行的,而主持诸人没有这样做,无疑是失去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殿本《二十四史》的错误不少。例如《元史·历志》,分列三国以来日食、月食记录。殿本第 15 页竟在刘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 年)日食后误接 20 行赵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 年)后至元代的月食记录。前后两个宋朝,时隔 800 年,而且日食与月食记录交混在一起,使读者无所适从(《校史随笔·元史·殿

本错简》)。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这样的编校质量,对史学研究者造成的危害是可以想见的。张元济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后序》中指出,殿本编纂者对宋元善本史籍"舍置不问,而惟踽踽于监本之下,因陋就简。既未能广事搜求,复不知慎加校勘"。造成的后果是"佚者未补,讹者未正,甚或弥缝缺失,以赝乱真。改善无闻,作伪滋甚"。这就是他下大决心,重校全史,克服殿本的错误与不足,嘉惠后来学人的初衷。

《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是张元济主持校勘、辑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大型古籍丛书。第一种《汉书》出版时间是 1930 年 8 月。那么准备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过了几年?张元济自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1930 年 6 月 5 日致傅增湘信中说:"《衲本二十四史》经营二十年,全赖友朋之赞助,幸得观成。"这是指他在"武昌革命军兴未数月"为涵芬楼买得一部宋景祐刊本配元大德延祐元统明正统本《汉书》,从而开始为《衲史》准备宋元底本而言的,尽管彼时还远没有形成辑印正史的完整构想。另一种说法是 1926 年 9 月 26 日致朱希祖信中说:"敝馆辑印正史,弟从事于此几及十年,近渐就绪,拟即开印。"这就是说 1915 年以后,张主持《四部丛刊》,《二十四史》是史部的主干,不能不列入书目,因此张从这时候起,亦必致力于《二十四史》版本研究,只是未找到足够的善本,条件不成熟,才未列入《四部丛刊》,待后来准备工作有了头绪,才另作一部独立的丛书出版。

选定所用的版本是准备工作中最主要的一项。为了使全史保持或尽可能地接近原来面貌,不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张元济倾全力搜寻最早、最好的本子。但宋、元旧本经历数百年沧桑,多已残缺不全,或受过水、火、虫、鼠等自然损害,或在流传

China

过程中出现错、讹、衍、脱和有意删削、窜改。因此每一部书都要寻找多种版本，作对比、校勘后，才能确定一种最佳本子作底本，所缺部分用他本补配。补配者要与原本相称，尽可能做到宋本宋配，若做不到，就退而用其次者补入。这样，全书，甚至说每一史，都是用不同版本的古本史籍集成的。藏书家曾以僧人所穿"百衲衣"来作比喻，称之为"百衲本"。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选用涵芬楼所藏善本之外，还要了解版本存世的状况，对有用的信息马上设法跟踪寻访，并与公私藏家通报版本收集的进展与优劣比较，征求他们的意见。1928 年，张元济去日本访书，在日本帝室图书寮、静嘉堂文库等处访到《史记》、《三国志》、《陈书》、《新唐书》的部分版本。因此每一史的版本收集和确定，往往前后要花费好几年。下面就现存几种文字资料中摘出关于《魏书》的记载，作为一例：

《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涵芬楼原来藏有蜀大字本《魏书》残本。

1926 年 9 月 26 日致朱希祖信中说："(《魏书》等)凡京师图书馆所有残宋本，均已照来。"

1927 年 10 月 18 日致傅增湘信，列出各史拟用版本清单，其中"《魏书》用北京图书馆残宋本，缺三十卷，以三朝本补。"

1927 年，张元济校阅《魏书》，撰成跋文和校勘记。

1930 年 1 月 30 日致傅增湘信中提到《魏书》在北图借到，又补以蒋氏藏本。尚有所缺，拟借用傅氏藏本。

1930 年 7 月，傅因藏本不清朗，闻得徐梧生家有较好版本，多次与徐恳商、谐价，以 2120 元购定，并立即表示以新购珍本借与商务摄照。张大为感动。

China

1931年,张元济发现全书还缺数十卷未摄照。董康介绍刘承幹藏本。张即从刘处借来全书,仔细检阅,发现还缺十余卷,决定从傅氏藏本补全。

1933年,摄照傅氏藏本。

1934年,因傅、刘藏本各有优劣,张元济亲自检看毛样,作比较鉴定。

1934年12月,又从北京借照到5页,全书定局。年底出版。

《魏书》封里上只有简单一句话:"上海涵芬楼影印北平图书馆、江安傅氏双鉴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及涵芬楼藏宋蜀大字本。"一般读者大约不会了解这几行字里面包含着主持人和他的助手们前后八年为这部仅50册的线装本《魏书》所花出的心血。

在访求善本的同时,第二项重要的校勘工作也在进行。1926年,张元济从监理职务上退休,便集中精力于《衲史》的校勘。这一年,商务成立校史处,在张元济寓所对面租赁两所民房,由汪诒年、蒋仲茀负责,从事校勘和描润。工作人员最多时约十一、二人。张元济要求每人每天填写工作日记。工作日记和校改的稿件下班时由蒋送交张元济,张当晚在灯下复核,第二天上班时发还各人。所以张每天工作到深夜。工作量之繁重可以用两封信来说明:1928年2月15日致傅增湘信称:"承假《南齐书》,去腊校读一过,撰有后跋。又校阅《魏书》、《宋书》、《陈书》、《齐书》,均已竣事,亦各撰有后跋。各书均另有校勘记,多者至千数百条。"1929年12月10日致胡适信:"《旧唐书》宋本只存三分之一,弟亦尚未校竟。其三之二幸尚有校本可以过录,但以一手一足之力为之,恐须数年

后全史方能毕功也。近甫校毕《魏书》(有十之七是宋本),其佳处胜于明监本、汲古阁本、殿本者不知凡几。继此将续校《北齐》、《后周》矣。""一·二八"事变之后,校史处停止了工作,1933 年恢复时迁到张的寓所内。"一·二八"事变,不仅延误了《衲史》出版的时间,而且正在摄影制版的蜀大字本《周书》被毁,使海内孤本从此失传,损失无可弥补,后来只能改用三朝本代替。(见《校史随笔·周书·卷末疏语》及《明补本多讹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重心渐渐由校勘转向描润和制版。因为很多古本过于漫漶,如简单地摄照,印出的文字也就模糊不清,无法辨读,但又找不到更好的本子来代替。这就需要先将原书摄照,印出底样,由初修者用粉笔清除底板上的污点,经复校后由精修者精修文字的叠影、溢墨等,但不可改动文字。如有疑惑,先记于左右栏外。精修后复校一次,如有不妥,再修、校一次,然后用殿本、南北监本、汲古阁本与精修好的底样对读,对有疑惑之字,注明某种版本作某字及校读人的意见,最终送张元济总校,以确定描清还是补缺,或仍空缺。缺字较多时,据他版写配于栏外,并注明据何本补何字,由精修人摹写,校对人校对,总校人复校。描润完毕再摄照一次。摄成后修片,再制版。印成清样后再精校,如发现错误,记录后交总校决定。精校少则二遍,多则五、六遍。认为完善者,由总校在每一页上签名、署年月日后送工厂付印。

《衲史》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傅增湘在《校史随笔·序》中,全面地对《衲史》成书的艰辛作了介绍,并对其学术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蔡元培在看到刚印出的《预约样本》(按:该书收入每一史殿本与百衲本对比的样张各一叶,两者优劣,一目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